

中国革命 与对外关系

杨云若 吴荣宣 王进

1-05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中国革命与对外关系

杨云君 吴荣宣 王进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哲波

装帧设计：蒋万景

中国革命与对外关系

杨云若 吴荣宣 王进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381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合肥杏花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31万

版次：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222-X/K·376

定 价：12.00元

印数：00001—01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这里没有一成不变的旧规可循,没有现成的章法规定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中国革命应如何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确定自己的斗争目标和方针政策,全靠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的不断探索和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创新过程。无数革命先为此而抛头颅、洒热血,它凝聚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毕生心血和精力,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有丰富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是各帝国主义大国觊觎和争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人民为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就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此,中国人民团结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前仆后继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中国革命与对外关系的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外关系史,也不同于中国外交史,它主要不是以国与国、政府与政府间的关系为

11.05.13

研究对象,而是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研究中国革命的对外关系,包括国际关系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中国革命与国外政府、政党及有关人士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等等。

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基本状况、各种政治因素的变化、各种阶级力量的相互矛盾和相互消长等等,决定着中国革命的任务、方针和政策,无疑是研究中国革命发展变化的基本内容,但同时也不可不研究外部因素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由于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奴役和侵略的国家,中国的政局往往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各种外部因素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常常起着相当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忽视这方面的研究,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解就是不完全的。

在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随时从国内外具体情况和中国革命利益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调整变换自己的对外政策和策略,使围绕中国革命的内外环境起到促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如今已成为我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借鉴和汲取营养的源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革命与对外关系内容极其丰富,研究这个专题,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更深刻的层次理解中国革命所经历的曲折、发展乃至最终获得胜利的道路。研究这个专题,常常使我们在研究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时,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

我们力求忠于历史,如实勾划出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为此,我们尽可能以可靠的原始资料作为研究问题的依据。但是,由于资料来源的局限,历史中的某些问题,仍处于朦胧状态,人们只能依靠零星的资料进行推断和分析,见仁见智。我们期望和等待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开放,以解答历史研究中的道道疑案。

我们三人均从事中国革命与对外关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

一本中国革命与对外关系研究的著作,是我们多年来的愿望。本课题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和安徽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夙愿得以实现。在此谨向有关部门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书第一、二章由杨云若执笔,第三、四章由吴荣宣执笔,第五章由王进执笔。全书由杨云若统稿。由于本专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我们研究的功力有限,书中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见谅,并诚盼指教。

杨云若 吴荣宣 王 进

1994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对外关系	(1)
(1919—1923)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
一、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五四运动	(1)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4)
三、到法国去！到俄国去！	(8)
第二节 共产国际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0)
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及其对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关注.....	(10)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3)
三、共产国际“三大”争取群众大多数的方针和马林 关于国共合作方针的提出.....	(18)
第三节 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反帝联合战线方针的提出	(22)
一、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22)
二、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24)
三、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 系问题的决议》	(27)
第四节 孙中山反帝联俄政策的确立和国共统一战线的 形成	(35)
一、《孙越宣言》.....	(36)
二、中共“三大”关于建立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	(40)
三、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国共统一战线的 形成.....	(42)

第二章 大革命时期的对外关系 (47)

(1924—1927)

第一节 共产国际和苏联积极帮助中国国民革命的开展 ... (47)

一、《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 (47)

二、共产国际和苏联积极帮助中国开展国民革命。

 黄埔建军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50)

三、共产国际“五大”和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

 领导权思想的提出。五卅运动和全国反帝风暴..... (59)

第二节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国民党团结

 统一的方针 (65)

一、192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65)

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国民党团结统一

 的方针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68)

三、北方的反帝爱国运动..... (75)

第三节 北伐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81)

一、北伐军占领长沙、武汉..... (81)

二、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

 对华政策..... (89)

三、武汉政府初期的反帝斗争——汉口、九江英租界

 的收回。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 (96)

第四节 武汉政府在内外交困处境中的对外方针。大

 革命的失败..... (107)

一、南京事件的交涉。蒋介石“四一二”政变 (107)

二、武汉政府在内外交困处境中的对外方针 (113)

三、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汪

 精卫的叛变和大革命的失败 (120)

第三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对外关系…………… (131)

(1927—1937)

第一节 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 (131)

一、帝国主义争夺中国…………… (131)

二、国民党蒋介石推行半殖民地外交政策…………… (135)

三、反帝运动的复兴…………… (139)

第二节 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 (145)

一、“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45)

二、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 (150)

三、毛泽东的政治路线…………… (157)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的英美苏政策…………… (160)

一、九一八事变,英美苏各行“不干涉政策”…………… (160)

二、华北事变和英美苏对策…………… (168)

三、王明路线…………… (174)

第四节 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179)

一、瓦窑堡会议…………… (179)

二、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 (185)

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1)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关系…………… (202)

(1937—1945)

第一节 呼吁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 (202)

一、卢沟桥事变…………… (202)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212)

三、毛泽东对卡尔逊的谈话…………… (222)

第二节 揭露“远东慕尼黑”阴谋…………… (227)

一、国际绥靖主义逆流…………… (227)

二、奇怪的欧洲战争…………… (238)

三、批评美日谈判牺牲中国	(256)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	(267)
一、中国共产党对苏、对美关系	(267)
二、珍珠港事变	(276)
三、在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281)
第四节 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	(291)
一、史迪威指挥权问题	(291)
二、毛泽东对谢伟思的谈话	(305)
三、与赫尔利针锋相对	(318)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对外关系	(335)
(1945—1949)	
第一节 苏联与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马歇尔调处国 共关系	(335)
一、斯大林的电报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335)
二、苏联在远东维护雅尔塔体制的努力与中共夺取 东北的战略	(338)
三、马歇尔调停与中共对美政策	(352)
第二节 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的扶蒋反共方针。苏联 对华政策的演变	(367)
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经济援助	(367)
二、国共内战初期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	(369)
三、三大战役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	(375)
第三节 中共领导人选择倒向苏联的政策	(381)
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覆灭。中共批判美中关系白 皮书	(381)
二、苏联对新中国建国工作的支持和对中共的戒备 心理	(385)
三、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	(388)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对外关系

(1919—1923)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

一、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五四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中国从此沦为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直至五四运动前，中国人民多次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斗争在打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在这过程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之途，但所有努力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很快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反响。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即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自此，中国报纸上不断出现报道俄国革命的消息。十月革命毕竟是人类历史由无产阶级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而取得的空前胜利，它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充满了对自身解放前途的热烈向往。所以，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最深刻的、

影响是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决定人类命运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从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

在中国，最早称颂和宣传十月革命意义的是急进民主主义者李大钊。他于1914年1月至1916年2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期间曾经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很快领悟到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的深刻含义，于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文章分析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后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中国人民对于十月革命，“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②同年11月，李大钊又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章，进一步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是“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建立“劳工联合的会议”。^③1919年元旦，他在所写的《新纪元》一文中展望：“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开创人类的“新纪元”。^④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于1915年秋创办的《新青年》杂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第2版，第1471页。

②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4页。

③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14—115页。

④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页。

志，^①曾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和旧礼教宣战，被中国青年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但它存在着强调思想文化运动而忽视现实政治斗争的倾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独秀在李大钊影响下，深感《新青年》不涉时政的原则已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1918年末，他和李大钊又一起创办了更具战斗性的《每周评论》，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德奥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号召人民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并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转载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一部分，译文前面的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处理善后，自1919年1月18日始，美、英、法、意、日、中等二十多个国家，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名义上是为议定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重新分割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北京政府派出外交部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祖等人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在全国人民强烈呼声下，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要求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不得由日本继承；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等等。然而，尽管列强之间特别是美日之间为争夺对华利益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但他们恃强欺弱维护在华既得利益的态度是一致的。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美国则拿中国问题作为对日讨价还价的筹

^① 《新青年》于1915年9月创刊，原名《青年》。自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自创刊至1917年，由陈独秀主编，1918年1月起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参加编辑部。1919年1月《新青年》第6卷第1号公布了编辑轮值名单。

码,达到利益均沾的目的。因此,对于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和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问题,他们答复说这些问题不属于这次会议讨论的范围;而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时,会议竟于4月下旬按日本意志作出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均归日本的决定。

中国人民对此群情愤慨。五月四日,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汇集天安门前,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举行游行示威。队伍本想向各使馆表示抗议,受到阻拦,便转向当年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曹汝霖的住宅,找到了正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曹汝霖、章宗祥和前驻日公使陆宗輿是段祺瑞对日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学生们焚烧了曹宅,痛殴了章宗祥。北京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2人。次日,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全国各地学生纷纷游行示威,给予声援。6月3日、4日,北京政府又捕学生近千人,激起了更大的愤怒。6月5日,上海工人和店员首先罢工罢市,声援爱国学生。随后,一百多个城市的工人阶级开始政治罢工,接着,商人相继罢市,赞助学生的爱国行动。於是,由知识分子学生参加的爱国运动,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性的反帝、反卖国政府的爱国运动。

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知识青年在其中起了先锋作用。尤其是中国二百万工业无产阶级在运动中显示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从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历史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为广泛和深入。李大钊把他

轮值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等文章，在该期和第6期发表了李大钊本人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出这三部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斗争学说正如李大钊所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了。此后，《新青年》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各国革命运动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李大钊还帮助《晨报》副刊，从1919年5月5日起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马克思的《劳动和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译文》、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论著。8月7日至11日，副刊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刊登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其它一些社会科学刊物，也不同程度地介绍或谈论着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除各自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外，还组建了许多研究组织，北京、上海、广州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山东有“励新学会”，武汉有“利群书社”等等。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已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注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同各种反对它的思潮进行论争的过程中得到传播和发展的。

这时，美国主张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威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来中国讲学，于1919年4月30日到达上海。从这时起直至1921年7月11日离华为止的两年多时间内，杜威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地到处讲演，宣扬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他说：“人类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可以解决的，人类的责任，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找某种解决方法”，以“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①他提倡以“各人的知识一点点的去改革”，去修正现代社会政治。他主张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

^① 《杜威五大讲演》，晨报社1920年8月版，第7、14页。

杜威的忠实信徒、中国学者胡适紧随其后，大力宣传这种主张，于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他在1922年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表明了他写这篇文章的用意：“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①可见，上述文章的矛头显然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现在需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请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②

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新青年》同人引起统治当局注意，李大钊准备出京到昌黎暂住。他看到胡适此文后，便于1919年8月在五峰山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应该使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他认为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所谓“根本解决”，就是“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他主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瞿秋白参加编辑的《新社会》、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都刊登了不少主张根本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文章。毛泽东于

^① 《胡适文存》(三)第96—97页。

^② 《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1919年夏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号召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改革。1919年9月，周恩来联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分子，建立了“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号召人们铲除帝国主义，改革旧制度。陈独秀通过监狱生活的磨炼，斗志更坚强了。1920年2月，他在武汉以《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为题的讲演中提出改造社会的三种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上述内容说明陈独秀此时已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接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于1920年8月出版，9月再版。

1920年3月，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游欧回国，在国内创办讲学社。同年9月，讲学社和北京大学联合聘请英国学者到中国讲学。罗素是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从1920年9月到中国至1921年7月回国，在北京大学和中国各地讲学。他反对十月革命，反对阶级斗争，说中国实业不发达，因而没有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他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并主张应“借用外国的资本”，以发展实业。他的讲演深受研究系分子的赞赏，张东荪、梁启超等人随之而起，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而不是社会主义。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文中说，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在中国兴起，“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张东荪说：“真正的劳农主义决不会发生，而伪的劳农革命恐怕难免。至于伪劳农革命发生，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①

其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同意罗素、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论调，纷纷致文《新青年》等刊物，阐述己见。他们认为发展实

^① 《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